

破局与重构：地缘政治风险影响下的世界经济秩序

# 破局与重构：地缘政治风险 影响下的世界经济秩序

张宇燕 盛斌 洪俊杰 刘鲁浩  
于春海 段玉婉 吴承骏 蔡龙飞

**编者按：**2026年，随着全面推进高质量发展和“四大全球倡议”落实落地，中国担当大国责任，将以自身发展为亚欧大陆发展提供更多新机遇、贡献更丰富的公共产品。同时，地缘政治风险给世界经济增添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则给遭遇逆流的经济全球化带来前行的新动能。在机遇与挑战叠加的背景下，欧亚经济或将依托禀赋优势，趋利避害，厚植韧性，在新的世界经济发展图景中彰显独特价值。

基于此，2026年第1期《欧亚经济》特别邀请张宇燕、盛斌、洪俊杰、于春海和段玉婉5位世界经济与国际贸易领域著名专家，围绕《破局与重构：地缘政治风险影响下的世界经济秩序》主题撰写一组笔谈文章，从不同角度分析全球化时代与世界经济变局的内在逻辑和环境演变，洞察国际经贸风云变幻及产业前沿领域走向。在“十五五”时期开启之际，《欧亚经济》以此为开篇，瞩望亚欧大陆发展新前景，期待在中国经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书写与欧亚经济合作共赢的新篇章。

## 全球化时代的挑战、机遇与应对之道

张宇燕(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院长)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的结束和现代科技迅猛发展，几乎所有国家都深浅不一地卷入了经济全球化浪潮。而随着众多促进贸易投资的多边、诸边、双边制度的涌现，跨境交通与通信变得前所未有的便利，生产成本与交易成本大幅降低，商品、服务、资本、劳动、信息得以大规模地、高频率地跨境

流动,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相互依存度达到了人类历史的新高度。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通过不断深化的分工和持续增长的贸易,全球生产要素配置效率得以提升,贸易收益得以扩大,又为全球经济增长做出独特的贡献。然而,近年来以世界各国间相互依存度不断上升为标志的经济全球化遭遇各种逆风与掣肘,全球化进程开始偏离曾经较为平坦笔直、两旁鲜花盛开的康庄大道,逐渐进入了相对曲折危险的路段。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经济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如果不能抓住机遇同时成功应对挑战,经济全球化进程便有可能被打断,其建立开放性世界经济的努力便有可能付之东流。

### (一) 全球化时代的挑战

当今时代经济全球化面临着诸多挑战,而首当其冲的便是特朗普政府推行的一系列添加全球不确定性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政策。特朗普对几乎所有国家提高关税的做法,以一己之利为大,完全置 WTO 这样的多边规则于不顾,以至于许多多边机制或平台被边缘化,全球经济日益呈现碎片化或集团化态势,经济民族主义特别是资源民族主义开始汇聚成一股洪流。与作为世界第一大国的美国之单边主义政策密切相关的是因全球治理式微而导致的全球问题愈发凸显。气候变化、生态环境压力以及随人工智能迅猛发展而来的种种风险(如数字鸿沟加大)等,均未得到有效治理。倘若全球治理赤字持续扩大的势头得不到遏制,将来人类很有可能在可持续发展问题上付出惨痛代价。

与此同时,地缘政治对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产生深刻影响。经济问题高度政治化业已成为全球化时代一个鲜明表征,并具体表现为国家间经贸、金融往来日趋武器化,制裁规模与强度以及被制裁国数量均远超以往,零和博弈正在危险地成为主旋律。更有甚者,国家间博弈由零和博弈转向负和博弈的事例不断增多,仅用零和博弈来概括当今世界大国竞争已经不够。零和博弈的特征是非赢即输、总量不变,负和博弈则只要竞争对手所受损失更大,“双输”乃至“多输”均在所不惜。此等认知与开放包容形同水火,更与互利共赢背道而驰。从互利共赢或正和博弈到零和乃至负和博弈,深刻反映着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根本区别。在经济关系中,博弈的本质是收益导向的增量博弈,其价值判断聚焦于效益的提升或折损,体现为“更优”与“次优”、“收益”与“损失”的二维度,倾向于整体收益大于零的正和博弈;而在政治关系中,政治博弈,尤其是大国地缘政治经济博弈,权力的主导性与支配性构成其底层逻辑,其价值判断聚焦于权力结构的非对称分布,即博弈者之间的位势差,强调维系乃至扩大位势差。对特定国家而言,扩大位势差可以通过两条路径

实现:其一为正向策略,即更加有效地提升自身综合实力;其二为负向策略,即打压竞争对手。尽管在压制对手的过程中自己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但只要对手遭受的损失超过自身损失,便可实现位势差的进一步拉大。当今世界的大国竞争正在地缘政治博弈中转向负和博弈,可以说是一个质的转变。

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看,上述挑战既起源于过去 30 多年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后果,也发轫于主要大国之间力量对比发生的深刻变化,还导因于由此而来的认知或理念的转换。首先,经济全球化在助力各国财富增长和相互依存的同时,其带来的好处并未惠及所有国家或绝大多数民众。全球化收益分配高度不平衡,无论是不同国家间,还是国家内不同群体间。一些福利没有得到明显改进甚至受损人群的不满,势必通过一国的对外政策表达出来。其次,当上述不满情绪被政客加以放大利用,极端化的保护主义、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政策便堂而皇之地大行其道。最后,大国力量对比发生明显变化是最重要的原因。随着世界多极化进程加速演进,美国强烈地感到了竞争压力,因此,为了维护其世界主导地位,不惜摒弃其领导建立的多边规则以打压那些竞争者。在国际舞台上,创建或改变规则的目的通常只有一个,那就是保障并拓展自身利益并压制竞争对手。几乎所有美国主导建立的多边规则都是非中性的,亦即同样的规则对不同的博弈参与者而言往往意味着不同的影响与约束作用。当博弈参与者认为竞争对手已对自身构成严重威胁时,认知与行为都会随之改变,因为经济领域的博弈事关经济收益的多寡,而安全领域的博弈事关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始后打出一套组合拳,搅得世界不得安宁。2025 年 8 月 21 日美国和欧盟联合宣布,双方已就《互惠、公平和平衡贸易协定框架》达成一致。该框架包含的一项重要内容是美国和欧盟将就原产地原则进行谈判并达成共识<sup>①</sup>。美欧是当今世界两个最大的发达经济体,他们所达成的协定框架势必关乎未来国际贸易体系的确立,很可能对国际经贸、投资乃至世界经济产生十分深远的影响。现行原产地原则是判定货物“经济国籍”的基础标准,核心是完全获得原则和实质性改变原则,后者又可分为税则归类改变原则和区域价值成分原则,以及特色加工工序原则。进行贸易活动的商品只有遵循原产地原则,且达到规定的标准后才能享受相应的减免税。完全获

---

<sup>①</sup> Joint Statement on a United States – European Union Framework on an Agreement on Reciprocal, Fair, and Balanced Trade, <https://www.commerce.gov/news/press-releases/2025/08/joint-statement-united-states-european-union-framework-agreement>

得原则针对全程在单一国家或地区生产的商品,它们可直接认定生产地所在国为原产地。实质性改变原则适用于多国参与生产的商品,判定的标准是商品在某国经过加工后,是否在税则归类、产品特性等方面发生本质改变,如果加工后发生本质改变,该国可被认定为原产地。区域价值成分原则要求商品在区域内的价值占比达到规定比例才能被认定为原产地。例如,“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USMCA)规定汽车区域价值成分需达 75%,也就是说,美、加、墨三国在进行汽车贸易的时候,在本地区生产的价值要超过 75% 才能享受免税。不难想见,美欧以原产地原则为基础的未来全球贸易体系大概率会融合上述标准,设定美欧区域价值门槛,把关键原材料供应和原产地认定绑定,制定差异性 or 歧视性贸易投资政策,最终实现在保护自身利益的同时打压竞争对手的目标。

全球面临的另一大挑战涉及气候变化,具体表现为清洁能源与低碳转型推进速度不如人意且快慢不均,而美国退出《巴黎协定》更是全球绿色发展的一大掣肘。2025 年 9 月 23 日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发表一般性辩论,称气候变化是有史以来最大骗局,欧洲正在被非法移民、绿色经济、可再生能源摧毁<sup>①</sup>。以绿色发展应对气候变化是涉及全球治理的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2025 年 12 月 3 日在巴西贝伦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十次缔约方大会(COP30)达成《全球动员:团结协作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政治文件,并建立了一个公正转型机制。然而,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如此看待气候变化和绿色发展,将对全球治理、全球问题的解决以及整个世界未来的发展方向产生十分不利的影响。

## (二) 全球化时代的机遇

纵观历史,挑战与机遇常常是并存的,机遇大致可以分成两类。

其一是随经济全球化演化、科技的进步而出现且助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新要素或新现实。新要素包括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以及适应新变化的新规则、新标准。新现实又可细分为“主动型”和“被动型”两类:前者是通过人类努力推动科技进步,进而带来包括运输与通信成本在内的交易成本的进一步下降,尤其是与人工智能进步密切相关的人力资本积累普遍加速;后者涵盖气候变化等危及人类生存的全球性问题,它们于挑战中蕴藏着机遇,要求人类必须采取集体行动加以应对,即要求各国通过合作共同把握。

---

<sup>①</sup>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 General Debate, 80th Session, <https://webtv.un.org/en/asset/k19/k1952w5l08>

其二是被中短期现实抑制,但终将发挥推动全球化前行的长期变量。例如,对人类进步发挥积极推动作用的经济规律,往往贯穿于贸易往来、分工协作与专业化生产的全过程。再如,那些在理论上、实践中被证明正确的基本经济秩序以及在其基础上产生发展的规则、制度。由于当前特朗普政府为了美国利益最大化而倒行逆施,这些长期变量的积极作用受到了短期压制。但对任何经济体而言,开放必然带来进步,封闭必然导致落后,这些长期变量终究要发生作用——拨乱反正,纠正一切偏离甚至违背基本经济规律的所作所为,重回以平等互利为基准的开放型世界经济轨道,进而造福全人类。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于释放上述长期变量来说是一个宝贵的机遇。因为该倡议的基本目标是推动建立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致力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最终实现全人类的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底层逻辑是互利共赢,强调的是正和博弈,符合基本经济规律和经济秩序,因而在其提出12年后已发展成为践行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和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平台。截至2025年5月,中国已与150多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推动海关通关、税收协定等标准化,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内,中国正同其他全球南方国家一道,通过双边与多边合作继承、改进、整合、创新现有国际规则体系,让国际制度趋于中性,甚至更有针对性地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sup>①</sup>。因此,在地缘政治挑战下,特别是大国竞争背景下,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是全球化时代的一个出路。

此外,2025年9月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上提出全球治理倡议。这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后提出的第四个倡议。至此,发展赤字、安全赤字、和平赤字、治理赤字与四个倡议一一对应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这对全球化时代来说是迎来了新的机遇。

### (三) 全球化时代的应对之道

应对当今世界面临的挑战,除了抓住上述机遇外,根本出路在于以互利共赢为目标的正和博弈思维与行动取代负和博弈和零和博弈。

不同文明或文化背景下的人对合作的理解有着显著的差异。在中国人眼中,合作至少意味着平等相待、取长补短,结果表现为互利共赢。这一思想

---

<sup>①</sup> 《张宇燕:“一带一路”的底层逻辑和世界意义》, <https://www.ecdc.net.cn/new/zjwz/6593.html>

早在体现中国先哲孔子思想言论的《论语》中便有记载。孔子讲：“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如果用经济学话语和逻辑表述，即为：如果想要改进自身福利，那就必须以他人福利的改善为条件。换言之，每个人的福利改进才是社会寻求的理想目标。这一思想被中国学者概念化为“孔子改进”，以对应西方经济学与社会学中的“帕累托改进”。所谓“帕累托改进”，指的是在一个社会群体中有人受益而无人受损，这固然好，却不够好，因为它并没有使所有人获益。相比之下，“孔子改进”比“帕累托改进”上了一个层次，处于更高的境界，契合当今时代发展需求和趋势<sup>①</sup>。当“孔子改进”的所有可能性都被穷尽时，社会便实现了“孔子效率”或“孔子最优”，也就是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通过合作使互利共赢实现了最大化。

实现“孔子改进”的途径多种多样，其中最为直接的途径之一便是自由贸易。在《国富论》中，现代经济学奠基人亚当·斯密就曾详尽阐释了基于不同产品生产率高形成的分工与交换，产生巨大的“得自贸易的收益”(gain from trade)，后者构成了国民财富的重要源泉之一<sup>②</sup>。后来大卫·李嘉图进一步丰富了斯密的思想，为贸易理论奠定了坚实基础<sup>③</sup>。尽管在历史上的某些时期，中国古代王朝曾奉行过闭关锁国、自我封闭政策，但总体来看，自由贸易理念和实践在中国具有悠久传统并占据主流。在两千多年以前的西汉王朝，中国出现了两部重要文献，一部是刘安等编写的《淮南子》，另一部是司马迁撰写的《史记》。在这两部文献中，作者们都意识到，人与人或国与国之间的分工生产和交换能够使各个参与方获益。在他们眼中，生财之道或经济增长，即所谓“货殖”，在于“以所有易所无”“以所工易所拙”“以所多易所鲜”<sup>④</sup>。用现代汉语表述就是：用我有的东西换我没有的东西，用我擅长生产的东西换我不擅长生产的东西，用我丰富的东西换我稀缺的东西。其结果便是互利共赢，各得其所，皆大欢喜。鉴于刘安和司马迁的观点与斯密和李嘉图的贸易理论如此之接近，我们完全可以将中国古人清晰的自由贸易思想概

---

<sup>①</sup> 《张宇燕：“一带一路”的底层逻辑和世界意义》，<https://www.ecdc.net.cn/new/zjwz/6593.html>

<sup>②</sup> [英]亚当·斯密，郭大力、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331页。

<sup>③</sup> [英]大卫·李嘉图，周洁译：《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华夏出版社2013年版。

<sup>④</sup> “以所有易所无”“以所工易所拙”载于刘安、何宁撰：《淮南子集释》，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772页（齐俗训篇对应原文句）；“以所多易所鲜”载于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930页。

括为“刘安—司马迁定理”。

对任何国家、群体乃至个人而言,平等相待、互利互惠方能共同繁荣,这已经在人类文明史中得到了证明。作为中华文明有机组成部分的“孔子改进”与“刘安—司马迁定理”,再加上作为古典经济学主脉之一的分工贸易理论,代表了开放与进步的文明史观,并为人类的发展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站在人类历史的十字路口,中国的选择是明确且坚定的,那就是:借助点滴的、局部的、持续不断的“帕累托改进”特别是“孔子改进”,通过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逐步趋近“孔子效率”,最终建成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相信,这同时也是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共同的愿景。

## 中美贸易关系透视全球经贸格局演变

盛 斌(南开大学副校长、“杰出教授”)

当前,全球格局与秩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和平与发展作为主题的时期已慢慢远去,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加速演进。在这个大背景下,中美两个大国的博弈不仅仅是贸易摩擦,而是不同力量、不同模式、不同道路的一种博弈。本文主要以中美经贸关系为观察点,分析全球经贸格局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以及这种变化意味着什么。

### (一) 全球传统经贸格局的形成及特点

全球传统经贸格局的核心是中心—外围的二元体系,它由殖民体系演化而来,西方国家、工业经济占据了主导地位,发展中国家、农业经济处于边缘。二战以后,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国家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推进全球主义、国际主义、自由主义和进步主义,开启了战后的全球化进程,客观上也带动了外围国家的发展。这个进程本质上是一个“美国化”的过程,也是对殖民时期“欧洲化”过程的某种延续。这个进程到20世纪90年代达到了顶峰,即“超级全球化”时代。

全球传统经贸格局与体系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这个格局与体系中存在非对称的权力和义务。中心国家主宰治理和规则,美国是霸主,外围国家基本上是免费搭车,他们不用开放互惠市场与承担对等义务,如发达国家对这些外围国家实行贸易“普惠制”。

第二,这个格局与体系中贸易和要素的流动性和可交易性不断扩大。从

## ABSTRACTS

**Zhang Yuyan, Sheng Bin, Hong Junjie, Liu Luhao, Yu Chunhai, Duan Yuwan, Wu Chengjun, Cai Longfei** The inaugural issue features a symposium of five specially invited experts who present papers on the theme Breaking the Impasse and Reconstructing: The Impact of Geopolitical Risks on the World Economic Order. They examine the inherent logic and evolving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and the world economy from diverse perspectives, providing insights into the shifting landscap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vestment, as well as general trends in cutting-edge industrial sectors.

**Tong Wei, Li Ziwen** As a key foundation of Sino-Russian bilateral economic relations and institutional coordination, tax cooperation has moved beyond traditional technical collaboration and become a critical driver of deeper bilateral cooperation. With the continued expansion of trade and increasingly diversified forms of cooperation, existing Sino-Russian tax cooperation mechanisms face a range of new challenges. Based on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evolution of bilateral tax cooper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stitutional barriers and structural constraints involved and proposes optimization pathway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olicy coordination, tax administration cooperation, and dispute resolution, with the aim of providing systematic solutions for deepening Sino-Russian tax cooperation.

**Keywords:** China, Russia, Tax cooperation, International tax governance, tax policy coordination

**Chen Yazhou, Li Xinying**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hina and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have achieved notable progress in cooperation on climate change. Such cooperation is fundamentally underpinned by high-level political mutual trust, linked by a shared consensus on green development, grounded in economic complementarity, common development aspirations, and abundant green resources, and further promoted by technological complementarities. Looking ahead, both sides need to establish a multidimensional coordination framework, actively advance cross-border water governance, develop efficient and sustainable green financing systems, foster a favorable investment environment for enterprises, jointly respond to geopolitical interference, and further enhance the voice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global climate governance, thereby promoting high-quality climate cooperation.

**Keywords:** Central Asia, climate governance, green development, Global Development Initiative